

書評論文

東亞陶器起源年代管窺（一）

—《泉福寺洞穴の發掘記錄》書後—

鄧聰

（一）

麻生優編著：《泉福寺洞穴の發掘記錄》，日本，佐世保市教育委員會，1984年3月，共287頁；序言，附表，圖版，15,000日元。

（二）

在日本千葉大學麻生優教授的指導下，本書總結了九州泉福寺洞穴遺址前後十年發掘工作的成果。報告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從遺址的**第10層**出土的陶器。這可能是現今世界所知最古老的陶器，對於世界陶器起源等重大問題的追探，有着積極的啓示作用。

全書共分六章：

- | | |
|----------------|--------------|
| 1. 序言； | 2. 泉福寺洞穴與環境； |
| 3. 調查經過； | 4. 層位與文化層； |
| 5. 層位、出土遺物與遺跡； | 6. 總結。 |

以下概括為地理環境與文化層遺物兩方面介紹。

(1) 地理環境

泉福寺洞穴遺址位於西北九州長崎縣佐世保市相浦川右岸之上。遺址的立地標高約90米。洞穴是由花岡質砂岩經風化作用後形成，穴口西南向斜傾。就目前地勢觀察，自西而東分別為第一至第四洞穴。四個洞穴相互緊靠，高度大約相近，因此很可能原屬於同一個大洞穴。洞穴的前庭略高，近中央部地勢則向下急斜，底部常有大量泉水湧出，可供飲用。

(2) 文化層遺物

從1970到1979年的夏季，經前後十次系統性的發掘工作，遺址面積約80%已發掘清理。據調查的結果，洞穴是由50多層的堆積物組成，在近40處的層位中發現了遺物，其餘是無遺物層夾疊其間。發掘報告者根據各層之間陶器和石器的組成變化差異，區分出舊石器時代至平安時代十二個文化層。以下據圖1由下而上分層介紹。繩文時代（新石

器時代) 押型紋陶器文化層以上的遺物因時代較晚，故略而不詳。

1 第12文化層：琢背小刀文化層

遺物分佈範圍非常狹窄，集中於第一洞穴前庭西端。石器有琢背小刀 (Backed knife)、圓頭刮削器 (Round Scraper)、雕刻器 (Burin) 和端刮削器 (End-scraper) 等。未發現陶片。

2 第11文化層：細石葉工藝文化層

此層分別由角礫層與黃褐色砂層組成。石器有細石葉石核素材，細石葉石核和刮削器。未發現陶片。

3 第10文化層：豆粒紋陶器文化層

此層分別由褐色砂層與灰白色砂層組成，分佈於第二洞穴前庭與第三洞穴之間。同層中發現了可能是爐址燒過的砂堆。砂堆長80、寬30cm，中央部稍微下凹呈皿狀。炭化物集中於附近出土，未發現有礫石與其他附屬物。在爐址附近B區10層C地點，發現了一個豆粒紋陶器的22件破片。依復原後推測，口徑約13、深24cm，底部呈圓形，口沿部內反，最大徑 (17.2cm) 為胴體的中央部。紋飾方面，斜或縱的粒狀 (長1、寬0.5cm) 間隔排列於口沿和上部 (圖1之第十一文化層，圖版1)。胎土似未經精洗，含粗砂，燒成溫度較低，估計在500°C以下。此外，黏土帶平均寬5cm，分五段上下接合成形，底部為圓形黏土板，直徑約4cm。由於陶器的內外表面均附有炭化物，推測可能是炊煮的工具有。這個陶器出土於隆線紋陶器的下部，經各種不同方法綜合測定年代，約為10,500~12,500年前。發掘者認為是現今世界所知最古老的陶器。

其次，同文化層還出土了豆粒紋與隆線混合的陶器破片。石器有細石葉石核素材、細石葉石核、細石葉石核台面製作過程中產生的橫長削片 (Spall) 和琢背小刀等，都是以黑曜石製成。

4 第9~7文化層：隆線紋陶器文化層

文化遺物廣泛分佈於第一、二、三洞穴，以第三洞內分佈最濃密，是古人宿營於洞穴中的最盛期。陶器以隆線紋飾最具特色，是以2或3條的附加堆紋，平行黏貼於陶器口沿附近。陶器內外常附有炭化物，推測可能是炊煮器。石器有細石葉石核素材、細石葉石核、縱長削片、刮削器和石斧等。年代方面，據熱釋光法分析第9層C區爐址中出土的礫石，被測定年代為11840±740年前。

5 第6文化層：爪形紋陶器文化層

文化遺物分佈於第二與三洞穴內的前庭。爪形紋陶器壁較薄，口沿部一般有指甲痕和刺痕等。紋飾的刻劃深入器面，清晰可辨。石器有細石葉石核素材、細石葉石核與削

片的重組接合 (Refitting)、邊刮削器、圓頭刮削器、雕刻器和尖狀器等。

6 第5文化層：押壓紋陶器文化層

文化遺物分佈於第一與第二洞穴內，可再細分為5a—5e層。陶器的紋飾，多集中於口沿部或唇部。石器有細石葉石核素材、細石葉石核、二次削片 (Second spall) 和有舌尖狀器等。

7 第4文化層：條痕紋陶器文化層

文化遺物分佈於第一與第三洞穴內。出現了典型的石鏃。

8 第3文化層：押型紋陶器文化層

9 第2文化層：繩文時代中、晚期文化層，亦包含若干彌生式陶器。

10 第1文化層：彌生時代至平安時代 (圖1)。

在結論中，麻生優教授特別強調指出，依據泉福寺洞穴地層壓疊上下的次序，陶器的紋飾的變化由下而上為：豆粒紋→隆線紋→爪形紋→押壓紋→條痕紋→押型紋，這個變遷的關係，可能不僅局限於九州地區，就是對整個東亞陶器的起源和發展問題的解決，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三)

本報告書綜合了泉福寺遺址多年的研究成果，圖文並茂，確實是日本九州考古學以及東亞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交流史裏，不可多得的鉅著。但可能是執筆者的緣故 (二十多人)，全書前後風格的統一，略有未如理想。第4和第5章的圖文先後重複，頗覺累贅。石器的鑑別，亦偶有可議之處。第6層的細石葉石核與削片重組接合 (圖1，第六文化層)，原報告將此分類作細石葉石核素材 (Microblade core blank) (原書頁89)。可是，根據接合的削片長度，可以推測是一件曾經生產過大量細石葉的殘核，故此不應被分類為細石葉石核的素材 (blank)。陶器的分析方面，豆粒紋陶器是否為日本最古老的陶器？又或者豆粒紋發展到押型紋的發展序列，是否具有普遍性等問題，目前日本考古學界還未有統一的意見。在本州的後野、¹ 大平山元 I 遺址中，² 曾發現了可能比隆線紋陶器還早的素面陶器。早期陶器如何從九州向北擴散到本州各地，現今尚

1 川崎純德：《後野遺跡》，後野遺跡調查團，1976。

2 三宅徹也、岩本義雄：《大平山元 I 遺跡發掘調查報告書》，青森縣立郷土館調查報告の5，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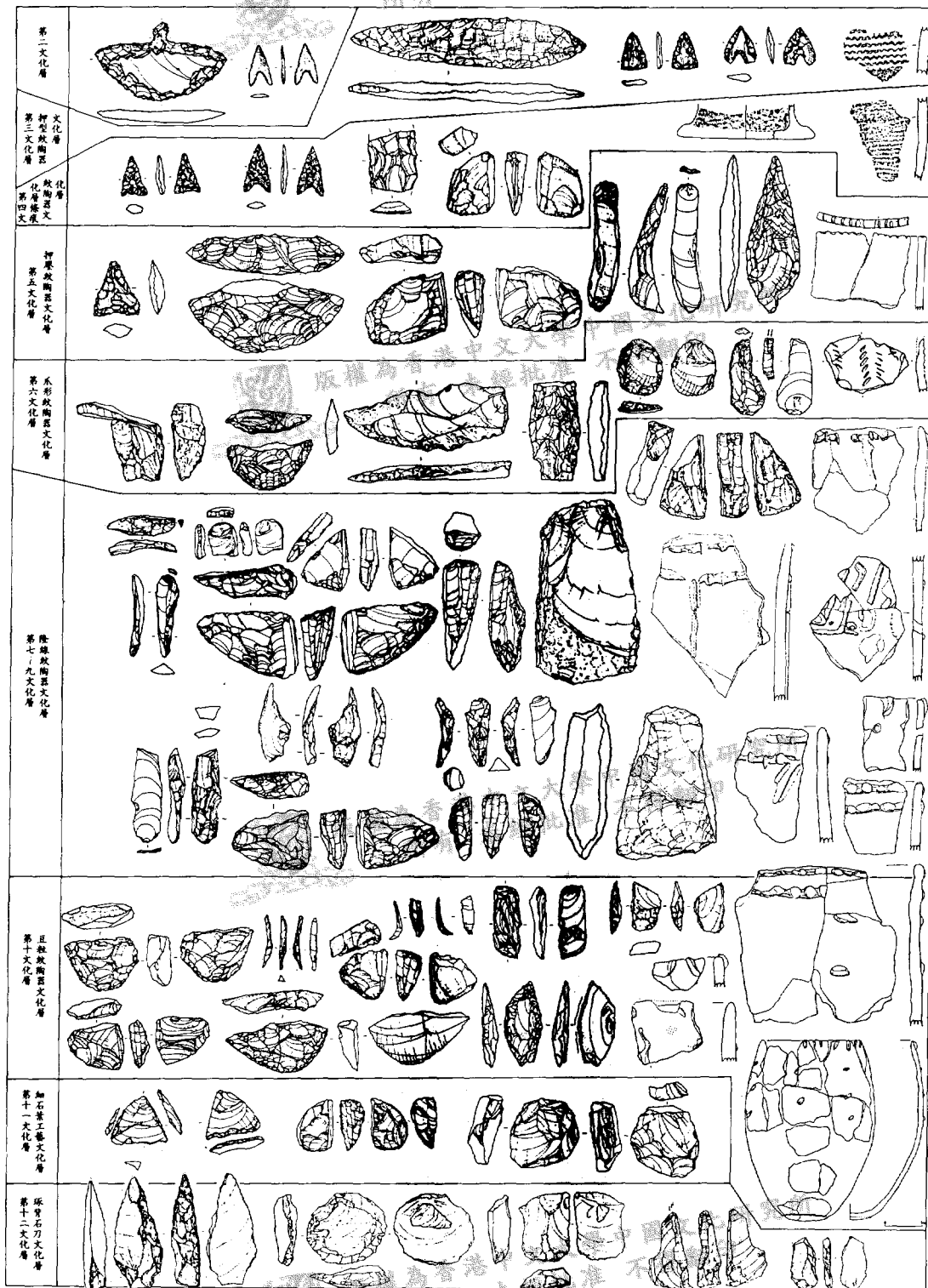


圖 1：日本九州東福寺遺址各文化層出土遺物

無定論。³ 自1942年開始，江坂輝彌教授便主張日本南北存在着兩個不同系統的古老陶器文化，是從不同的通路擴散進入日本。⁴ 這個學說是值得重視的。其次是陶器紋飾編年的問題。岡本勇氏基本上否定了從豆粒紋發展到隆線紋的內在連續性。⁵ 事實上如果過份強調隆線紋→爪形紋→押壓紋的型式變遷關係，只會使問題變得太單純化。最近土肥孝氏對繩紋草創期前半陶器的破片仔細觀察後，指出其中還混雜有少量的櫛目紋、沈線紋、刺突紋、條痕紋和素面等型式的陶器；又或者是隆線紋、爪形紋和押壓紋施於同一器面上，這些事例都反映出問題的複雜性。⁶ 以上是對本報告書中的觀點略作補充和訂正。下文嘗試就世界史前學的角度，對東亞各地如西伯利亞、外蒙古、朝鮮半島、中國、日本等早期陶器的年代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以供參考。

(四)

自從1949年 W. F. Libby 開展了“放射性碳素革命”運動以來，⁷ 革命之風一如澎湃之洪潮，莫之能禦。O. Montelius⁸ 和 V. G. Childe⁹ 等嘔心瀝血所建立的歐洲與近東文明編年體系，被猛烈的攻擊後呈現出千瘡百孔。同樣地 S. Elliot 等所鼓吹的世界史前文化交流的史觀，¹⁰ 雖然曾一度甚囂塵上，畢竟其虛構的本質終被完全暴露無遺。放射性碳素革命之偉績，在於掃蕩過往史前學者的民族偏見與虛妄臆測，從此世界史前學綜合的研究 (the unity of world prehistory) 得到了迅速的開展。考古學研究進入了「Post-V. G. Childe 時代」，新的典範在逐漸形成。¹¹ 愈來愈多的考古學者對人類文明起源的問題，傾向於多元性和多次發生的理論。這個革新的觀念，具體地反映在世界陶器文明起源的問題上。

3 小林達雄：《繩文時代の成立》，《日本原始美術大系1・繩文土器》，1977，頁155。

4 江坂輝彌：《繩文土器文化研究序說》，六興出版，1982，頁2。

5 岡本勇：《繩文土器の生成から發展へ》，《繩文土器大成》第1卷，講談社，1982，頁114-124。

6 土肥孝：《繩文文化起源論》，《繩文文化の研究》第3卷，雄山閣，1982，頁21。

7 Renfrew C. 1973, *Before Civilization — The Radio Carbon Revolution and Prehistoric Europe*, 1979 Reprinted by Penguin Books Ltd. 書中 Renfrew W. C. 首次提出「放射性碳素革命」的稱謂。大良貫夫譯：《文明の誕生》，岩波現代選書，1979。

8 Montelius O., 1903, *Kulturperioden im Orient und in Europa I. Die Methode*, Stockholm。濱田耕作譯：《考古學研究法》，1932，岡書館初版，1984年雄山閣再版。

9 Childe V. G., 1939,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3r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Kegan Paul —, *The Orient and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44, pp. 10-26.

10 Elliot S. G., 1933, *The Diffusion of Culture*, London, Watts.

11 Daniel G.,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 178-198.

石器時代的原始社會裏，陶器的發明帶來了人類飲食生活的激烈變化。大部份植物類食品，經放進陶器作適當的炊煮後，變得更容易消化吸收，增強了原始人類的體質。另一方面，若干從前不能食用的食物，由於使用陶器烹調的關係，亦變得更美味可口，擴大了食物的來源。¹² 在石器時代陶器的出現，無疑是象徵了一個劃時代的大變動。然而，作為人類歷史裏偉大發明之一的陶器，究竟始於何時、何地，哪一個民族所發明的疑問，長久以來就是不解之謎。一直到19世紀以後，經考古學者不斷的努力，其神秘的面貌才逐漸被揭露出來。

鄧4

19世紀以來，西歐列強基於政治與軍事的原因，西亞考古學史上的“大發掘時代”的序幕，也就被徐徐掀起來。¹³ 這裏在歷史時代曾為舊約的聖地，又是古巴比倫、亞西里亞(Assyria)王國政治和文化的舞台，更被19世紀考古學者認為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他們相信，從新石器時代開始，西亞農業文明的主人，首次製造了陶器，以後隨著新石器文化的擴張，陶器的製作技術便傳遍世界各地。在這樣的學說鼓動下，「文明溯源於東方」之說在歐洲遂盛極一時。1897年後，Jacque de Morgen在Susa遺址；¹⁴ 1904年H. Schmidt和Pumpelly在Anau遺址，¹⁵ 先後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絢麗奪目的彩陶農業文明，震驚了世界史前學界，並且成為稍後在美索畢達米亞、印度和中國等相繼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彩陶農業文明之故鄉。¹⁶ 約距Morgen發掘Susa遺址20多年後，1921年在東方古老神秘的中國，由瑞典科學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首次宣佈發現了彩陶。根據這個重大的發現，安氏先後提倡了中國和仰韶文化西來說。¹⁷ 半世紀以來，其影響力仍是廣泛和深遠的。¹⁸ 如果說這個學說是安氏的創見，毋寧說這是當時世界考古學界一

12 IKawa-Smith F., 1976, On Ceramic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7, No. 3, pp. 513-514.

13 江上波夫：《聖書傳説と黏土板文明》，平凡社，1984，頁75。

14 Le Breton, L., 1947, *Note Sur la Céramique Peinte Aux Environs de Suse et à Suse*, Mémoires de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Iran, XXX, Paris.

15 Pumpelly, R., 1908, *Exploration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of Anau*, 2. Vols., Washington.

16 Daniel G., 1975,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 Duckworth, p.209.

17 Andersson J. G., 1923,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vol. 5. pp. 1-68.

18 從中國文化西來到仰韶文化西來，再轉為彩陶西來諸學說議論紛紜，持續達半世紀以上，至今未息。在60年代間，張光直教授曾對比了 Hassuna Halaf 期與半山期的彩陶(Chang K. C. 1965, *Relative Chronologies of China to the End of Chou, Chronologi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edited by Ehrich R. W., Chicago)。稍後增田精一教授詳細對比了西亞與仰韶文化的整體面貌，指出彩陶可能是象徵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緒端(《彩文土器の東傳》，《漢とローア》護雅夫編集，平凡社，1970)。70年代後，部份中外學者以仰韶文化放射性碳素年代的資料，針對仰韶文化西來說提出了有參考性的意見。惟據近年研究結果西亞 Hassuna-Halaf 期年代為5,800~5,200 B. C.，比仰韶文化的上限4500 B. C.

般的見解。1935年，我國考古學界裏的頂尖人物梁思永先生，在其大作《小屯龍山與仰韶》中，¹⁹也是只能在「西來說」的局限下作討論。究竟東亞陶器的淵源何自？是否如安氏推測起源於西亞？這些疑問的解決，直到50年代的末葉，才出現了新的轉機。1960年 W. F. Libby 因創立碳14測定年代方法，取得了諾貝爾化學獎。²⁰然而，在此以前放射性碳素革命之風，已越洋東渡首先登陸於日本列島。1959年，日本明治大學杉原莊介教授發表了據密西根大學測定的夏島貝塚第一貝層碳14年代測定為9240±200 B. P. (M 770~M771) (木炭)，9450±400 B. P. (M 769) (貝殼)兩個數據，同層出土了夏島式陶器。²¹往後一年，芹沢長介教授等於九州長崎縣福井洞穴遺址的第3層中，發現了陶器與細石葉石核共存出土，碳14年代測定為12,400±350 B. P. (Gak-949) 與12,700±500 B. P. (Gak-950)，同層出土的隆線陶紋陶器，是當時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圖版2)。²²這些在當時看來似乎難以置信的新發現被視為破壞了整個世界考古學的秩序，²³猛烈衝擊了長久以來考古學界所信奉的世界陶器起源的定論。當然會受到比較保守的學者所批評。有繩文時代研究之父之稱的山內清男博士以及東京大學佐藤達夫教授，²⁴，一直到70年代還是側重東亞大陸遺物的編年，對碳14年代說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

如果以50年代歐洲和西亞考古學發展趨勢來分析，山內和佐藤反對碳14年代說的立場是不難理解的。50到60年代間，是世界史前學舞台上最動蕩的十載，失望與讚嘆、批

為早。Hassuna 期出土的彩陶與中原仰韶彩陶相似之處亦不少，如平坡遺址出土的方格小魚圖案與 Hassuna 期所發現者極相像。(Mellaart J., 1975, *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Redman C. L., 1978,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東西間的彩陶是否各有其淵源？就現今資料判斷，如果以舊石器晚期東北亞所發現具有共同特徵的楔狀細石葉石核的廣泛分佈範圍來推測(加藤晋平、松本美枝子：《日本細石刀文化之源流》，《史前》，25號，1985)，史前人類的活動範圍之廣大，是不容低估的。原始人隨著動物季節性流動，作長途遷徙的範圍可達300 km以上(Bahn. P. G., 1977, *Seasonal Migration in South-west France during the Late Glacial Perio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4, p.246)。同時，文化的交流並不局限於具體的物質或技術的互相交換。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者 Kroeber A. L. 所主張「誘發式傳播」，就是著重創意上相互交流或影響的作用，同樣是不容忽視的(Kroeber A. L., 1940, *Stimulus Diffu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42, p.1)。新疆與安諾(Anau)遺址出土的彩陶風格形制都很相似(王治來：《中亞史》第一卷，1980，頁1)。東西間文化交流史裏，在絲綢之路以前，可能已存在過更古遠的彩陶之路，有待今後努力研究。

19 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梁思永考古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59，頁96—97。

20 湯淺光朝著、張利華譯：《科學文化史年表》，科學普及出版社，1984，頁148。

21 芹沢長介：《石器時代の日本》，築地書館，1974，頁101。

22 鎌木義昌、芹沢長介：《長崎縣福井洞穴》，《日本の洞穴遺跡》，平凡社，1967，頁256—265。

23 芹沢長介：《日本舊石器時代》，岩波新書，1982，頁99。

24 山內清男、佐藤達夫：《繩紋土器の古さ》，《科學読売》，卷14—12，1962，頁1—13。

判與歡呼交雜之聲不絕於耳。最先是近東農耕和都市的古老年代，大出人意表，「世界最古××」等字眼，一時為考古學者所樂用。1956年在Jericho (Palestine) 的發掘者 Kathleen Kenyon 發現了所謂世界最古老的村落，碳14測定年代是 6250±200 B.C. 與 5850±200 B.C.，比預計的年代早了1500年以上。²⁵當時學界對這個古老年代的數據，一般是採取了觀望的態度。例如在Iraq的Jarmo 遺址發掘的近東考古學著名學者 R. Braidwood，也同樣表示了對上述兩個數據懷疑和觀望的態度。²⁶同年，V. Milojčić 精密對比了歐洲新石器時代各文化的編年後，批判地指出碳14年代測定法最少有千年以上的差誤。此後，傳統編年派與碳14年代派在英國 *Antiquity* 雜誌上互相攻訐，壁壘分明。一直到了60年代初期，論戰局面才漸見明朗。同年11月，G. Daniel在*Antiquity* 《編者的話》中，作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論述：²⁷

We shall see in the next quarter century the one thing that we are all waiting for — a complete and accurate dating of the main stages in the ancient development of men. We are now entering a new era of prehistory, and many of us are forgetting the drama of the moment. Radiocarbon dating is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20th century prehistory.

60年代初期日本考古學界如果能普遍充份理解以上的史實意義，從夏島貝塚與福井III層所測定的古老年代數據，可能就不會引起日後學術界裏爭論的軒然大波。山內和Milojčić一樣，同是新史前學時代裏的逆流，“forgetting the drama of the moment”。1960年後，從九州到東北山形縣六十多個遺址裏都發現了隆線紋陶器的踪跡。²⁸多種方法測定它的年代都在10,000~12,000年前之間，²⁹這比現今所知東亞以外所發現的陶器年代都要古老。因為在東菲 Kalambo 遺址 Magoei 文化期³⁰以及西亞 Ganji Dareh E 層，³¹出土了可能是10,000年前的陶器。歐洲方面，意大利、哥西加、西班牙等地都只發現了8,000年前的陶器。³²這麼一來，日本隆線紋陶器比上述世界各地出土的陶器，早二、三千年。過去長期以來認為東亞陶器源於西亞的學說，也就不攻自破。東亞是世

25 Kenyon K., 1956, Jericho and its setting in Near Eastern history, *Antiquity*, Vol. 30, pp.184—197.

26 Braidwood R. J., 1957, Jericho and its setting in Near Eastern history, *Antiquity*, Vol. 31, p.74.

27 Daniel G., 1960, Editorial, *Antiquity*, Vol. 34, September, pp. 161—162.

28 鈴木保彦：《草創期の土器型式》，《繩文文化の研究》，第3卷，雄山閣，1982，頁44—65。

29 キーリ、C. T.、武藤康弘：《繩文時代の年代》，《繩文時代の研究》，第1卷，雄山閣，1982，頁246—275。市川米太：《土器の年代をはかる一熱ルシネセンス法》，《考古學のための化學10章》，馬淵久夫等編，東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91—114。

30 Coles, J. M. and Higgs, E. S., 1969,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 London pp.108—144.

31 Smith P., 1972, *Ganji Dareh Tepe, Iran X*, pp. 165—168。井川史子、フィリップ、スミス：《土器の使用のはじまり「西アジア」》，《考古學ジャーナル》，No. 239, 1984, 頁25—29。

32 Milisauskas S., 1978, *European Prehistory*, Academic Press, pp. 41—125 深沢百合子：《土器の使用のはじまり「ヨーロッパ」》，《考古學ジャーナル》，No. 239, 1984, 頁20—24。

界陶器起源地之一。東亞陶器起源的年代比西亞還早。在舊石器時代的晚期，東亞的舊石器文化已自成體系，源遠流長。³³

(五)

東亞早期陶器的古老淵源，自樹一幟，在世界史前學上大放異彩。目前，東亞早期陶器的研究工作做得最多，成果最豐碩的國家之一是日本。在九州和本州所發現的隆起線紋陶器年代和發展系列，都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究竟為甚麼在更新世晚期到完新世初期，日本列島出現了這樣一系列古老的陶器文明？如果要解答這個疑問，顯然需要從東亞整個地域的背景去了解。這樣就有必要對當前東亞各地所發現最早期的陶器，作一綜合的分析。近年來隨著碳14年代測定法的普及推廣及各地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東亞各地陶器起源的年代，大都從已往的定說又再推早了數千年。

西伯利亞

世界著名的蘇聯考古學家Okladnikov(1908—1980)在其1973年的鉅著《西伯利亞的古代文化》裏，清楚地指出從8,000~10,000年前，西伯利亞並未發現有陶器和磨製石斧。一直到了新石器時代初期6,000~7,000年前間，Amur河畔Blagoveshchensk附近才發現了隆起線紋陶器與石葉鏃共伴出土。³⁴近年來，據K. A. Kirilovich氏的研究，西伯利亞陶器的起源年代，還可能再向上推早一、二千年。³⁵

其次，另一項現今還未正式發表的重要發現，由芹沢長介教授於1984年旅西伯利亞後透露。據謂於貝加爾湖東南方ウスチ、カレンガ遺址發現了距今7,000~10,000年前的陶器文化。陶器為櫛目紋，器壁較薄，共存的石器有細石葉石核和雕刻器等。³⁶雕刻器與日本荒屋遺址和中國十八站遺址出土的橫截雕刻器相似。如此，過往西伯利亞最早的陶器不超過4,000B. C. 左右的舊說，今後肯定需要大幅度的修正。

此外，還有一項重大的發現是1980年在Krasnoyarsk附近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13,000~15,000年前)的人像陶偶。³⁷陶偶呈赤褐色，燒製不良，具有頭、二手和二

33 Tang C. and Gai P., 1986, *Cultural Chronology of Upper Palaeolithic Cultures in North China*, *Advance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5, Academic Press, (in press).

34 OKladnikov 著，加藤九祚與加藤晉平譯：《シベリアの古代文化——アジア文化の源流——》，講談社，1974。

35 Kirilovich K. A., 1979, *Drevnie Pamiatniki O. Olikhona i Priolikhonia*, Institut Istorii, Philologii i Filosofii, Novosibirsk.

36 芹沢長介：《土器製作のはじまり》，《考古學ジャーナル》，Vol. 239, 1984, 頁2-7。

37 Abramova, Z. A., 1984, *Pozdnie Paleolit Aziatskoi Chasti SSSR Arkheologiya SSSR*, Vol. 1., Paleolit SSSR.

足；高9.6、寬7.2、厚1.9cm。這個發現對西伯利亞早期陶器起源的追溯，有重大的啓示作用。

蒙古人民共和國

192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初期考古工作調查活動並不活躍。到了1947—49年，蘇聯S. V. Kiselyov與A. P. Okladnikov氏組織了蒙古歷史、民族調查團，開展了從石器到歷史時代的調查工作。³⁸以往，一般只知道外蒙古新石器時代的早期文化裏，出現了櫛目紋陶器，但文化年代不詳。1978年A. P. Okladnikov在Buryatskaya自治共和國的烏斯季恰克圖居址遺跡中，發現了原始陶片與細石葉石核共伴出土(圖版3, 1—9)。³⁹這個報告書現今還未發表。1984年芹沢長介教授於西伯利亞歷史語言哲學研究所內曾觀察了這個遺址的實物。據謂三件陶器的破片(圖版3)均呈暗褐色，一件爲口沿部，其餘二件是胴體部。口沿部的一件內面有細長條痕，沒有文飾。胎土內有細小的石英和粗大的纖維痕跡。器壁厚約3mm。同陶片伴出的木炭經¹⁴C年代測定爲11505±100B. P. (COAH. NO. 1552)和12,595±150B. P. (COAH. NO. 1553)。⁴⁰這樣蒙古地區古老陶器的出現年代，便一舉追溯到舊石器時代的晚期。

朝鮮半島

1945年朝鮮半島考古學研究在民族自主後，有了較大的發展。現今朝鮮半島的南北部都發現了早於櫛目紋陶器的新石器文化。⁴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咸境北道雄基郡屈浦里貝塚遺址、三峯遺址和平安北道滿浦遺址裏，在櫛目紋陶器層的下層，均發現了素面陶器。⁴²由於以上遺址的絕對年代不詳，這裏暫且不論。

韓國方面，慶上南道釜山市影島區東三洞遺址和江原道襄陽郡襄陽面鷲山里遺跡裏，都發現了朝鮮半島現今所知最古老的陶器。東三洞遺址在戰前1933年橫山將三郎氏曾作過系統的研究。⁴³戰後，A. Mohr和C. Sample⁴⁴以及國立中央博物館都曾經先後

38 平井尚志：《北アジアナI(モンゴル)》，《世界考古學事典下》，平凡社，1979，頁1303—1306。

39 奧克拉德尼科夫著，姚鳳譯：《西伯利亞歷史探源》，《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1期，頁114。

40 同注36。

41 Sara M. N., 1982, Recent Progress in Korean Archaeology, *Advance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1, New York, p. 109.

42 金元龍著，西谷正譯：《韓國考古學概說》，六興出版，1984，頁43。

43 橫山將三郎：《釜山府絕影島東三洞貝塚報告》，《史前學雜誌》，卷5—4，東京，1933，頁1—49。

44 Sample, L. L., 1974, Tongsamdong: A Contribution to Korean Neolithic Cultural History, *Artic Anthropology*, Vol. 11—2, pp. 1—125.

發掘調查。除零散的簡報外，本遺跡最後的報告書還未刊行。關於這個遺址地層堆積等問題，在韓國內外，有過一些爭論。韓國文化研究院金廷鶴教授曾立論反對金元龍氏和坂田邦洋的東三洞文化編年體系，甚至指出此遺址地層曾受相當的攪亂。⁴⁵然而，江坂輝彌氏曾按地層堆積與碳14年代測定的數據對以上的意見予以有力的反駁。⁴⁶此外，韓國考古學長老金元龍教授在1984版《韓國考古學概說》裏，將東三洞遺址分為III期。東三洞I期年代距今 5,000 B.C. ~4,000 B.C. 此層中出土有豬形陶偶破片、尖底V形素面陶器、口沿紋陶器、平底鉢和平底長頸隆線紋陶器等。⁴⁷

其次是1981年由任孝宰教授發掘了另一個比東三洞I文化還略為古老的是鰲山里遺址。⁴⁸遺址裏第I文化層出土的木炭測定年代數據是 7,120±700 B.P. (Ksu-492)，修正年代是 6,000~5,300 B.C. 之間，為現今已知朝鮮半島最古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同層出土有較小的寬口陶器。陶器表面有修整痕跡，口沿部刻有點或線。其上的一層則出土隆線紋陶器。此外，在B地區“隆起土器層”中，發現了隆線紋陶器，碳14年代測定為 7050±120 B.P. (Ksu 515)，修正年代為 6000~5350 B.C.，與第I文化層的年代相接近(圖版4)。如此，朝鮮半島早於8,000年前已出現了陶器。

中國

目前我國部份考古學者還是堅持「陶器的出現只不過八、九千年的歷史」，⁴⁹或者以為裴李崗、磁山文化是早期的新石器文化遺物。⁵⁰可是另一方面，例如甌皮岩洞穴和萬年大源仙人洞下層都曾發現了約9,000年前的陶器。⁵¹特別是仙人洞下層出土的炮彈型圓底的陶器，型式古拙，給人極深刻的印象。還有是江蘇溧水縣神仙洞上層中，發現了與最後蠶狗一起出土的一片泥紅陶，同層出土的木炭據碳14年代法測定為 11,200 ±

45 金廷鶴：《幾何文(櫛文)土器的編年》，《考古學ジャーナル》，No. 183，1980，頁2-10。

46 江坂輝彌：《西北九州地方の繩文文化と朝鮮半島南部の先史文化》，《考古學ジャーナル》，No. 183，1980，頁10。

47 同注42，頁43。

48 任孝宰、權鶴洙：《鰲山里遺蹟》，大邱大學博物館，1984。Im H. J., 1984, Essai de Chronologie du Néolithique Coréen, Commission Nationale Coréenne pour l'Unesco, Vol. 16, No. 4, pp.18-19.

49 安志敏等：《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中國陶瓷史》，1982，頁1。

5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984，文物出版社，頁35-41。

51 上海博物館實驗室：《熱釋光測定年代報告(一)》，《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頁306。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碳14實驗室等：《石灰地區碳14樣品年代的可靠性與甌皮岩等遺址的年代問題》，《考古學報》，2期，1982年，頁243-250。

甌皮岩遺址出土的陶器，用熱釋光測定年代約為9000年前。有關石灰地區碳14樣品的污染問題，據說差誤在1~2千年之間，可以修正。

1,000年。⁵² 上述三處遺址都是60和70年代的研究成果，應當充分考慮其年代的可信性。綜合東亞早期陶器資料推測，我國陶器的起源，很有可能上溯到13,000年以前。最古老的陶器可能與細石葉工藝的文化遺物（microblade industry）共伴一起，仍然沈睡在無垠的黃土堆中。其次，近年來若干考古學者引證西亞無陶新石器文化（pa'keramische neolithische Kulture）提倡中國新石器時代裏亦存在「前陶新石器遺址」⁵³ 和「先陶文化」⁵⁴ 等論調。這些都可能是低估了我國陶器古老的傳統淵源，不無可商榷之處。

綜觀現今所知東亞早期陶器年代的資料：日本和外蒙在12,000~10,000年前之間；中國南部在10,000年前左右；中國北部和西伯利亞都可能在9,000~10,000之間；韓國是8,000年前左右。這些資料顯示出東亞中部和南部都可能有超過10,000~12,000年前的陶器。這是否意味著到了舊石器時代的晚期，在東亞南北部廣大地域中，出現了多個陶器的起源中心地區呢？目前這個大膽的假設，是難以證實的，只能作為今後研究的一點線索。

至於日本早期陶器的淵源問題，自生說⁵⁵ 雖然不一定與其它的學說互相排斥，惟在目前東亞大陸還未進行徹底的考古調查以前，同樣是難以證實的。這樣，中國大陸中心起源論當然是最值得加倍注意的。從古地理和海岸線變遷等資料來分析，⁵⁶ 日本與英倫三島頗為相似，既是孤立的列島又與大陸唇齒相依，列島文化形成和發展，與大陸間始終是息息相關的。京都大學樋口隆康教授曾考證史前大陸與日本間文化交流通途有五：

- 其一：北方通途。從西伯利亞東北端經薩哈林（樺太）自北海道進入。
- 其二：從東北亞沿岸橫渡日本海於北陸、北陰進入。
- 其三：從大陸東北經朝鮮半島自九州進入。
- 其四：從長江出口一帶經黃海自九州進入。
- 其五：從南洋一帶傳入九州。⁵⁷

52 南京博物館：《江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頁198。

53 張之恒：《關於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幾個問題》，《史前研究》，3期，1984，頁57-62。

54 安志敏：《略論華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考古》，10期，1984，頁944。同文注73安氏引用拙文《安志敏の細石器の消滅論との他について》，《文化》45卷，1981，安氏誤譯拙文原意。原文為「今日の考古學者はまだ舊石器時代晚期と早期新石器時代の文化と完全に關連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ないようである。」（頁31）意謂現今考古學者尤未能將舊石器時代晚期與早期新石器時代完全連接起來，有待他日之努力。

55 麻生優等：《繩文土器の起源》，《國學院雜誌》，81卷1號，1980，頁19-63。

56 海洋地質研究室：《黃東海地質》，科學出版社，1982。

57 樋口隆康：《日本文化の源流—アジアの中の日本》，《日本文化の歴史》，小學館，1979，頁34-35。

如果假設目前在九州所發現最早的隆線紋陶器並非起源於日本，這些陶器究竟是沿著哪一條通途傳播到日本呢？上述的第一和第二的通途看來與九州早期陶器的出現關係不大。第三條通途方面，芹沢長介教授曾指出，九州福井遺址第3層出土的陶器和細石葉工藝文化遺物，可能是淵源於東亞經朝鮮半島進入西北九州。⁵⁸另一個可能性是第四條的通途。這一條在彌生時代前後曾為稻米之道，稍後倭之五王使者、遣唐使等亦曾絡繹於途，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如長安、洛陽與日本往來最便捷的途徑。可是在更古遠的石器時代，這條通途是否已經存在了呢？近年來，在江蘇省東海縣大賢莊遺址裏發現了不少楔狀細石葉石核。⁵⁹廣州市西樵山東麓地點遺址，亦發現了大量楔狀細石葉石核和琢背小刀（圖2）。⁶⁰其中若干細石葉石核素材曾經由兩面加工製成，細石葉生產之先偶亦可能打出第一與第二削片（First and Second Spall），一般則採用橫方向台面修整技術，都和福井技法⁶¹有一定的相似。結合中國南部曾發現一萬年前陶片的資料推測，舊石器時代晚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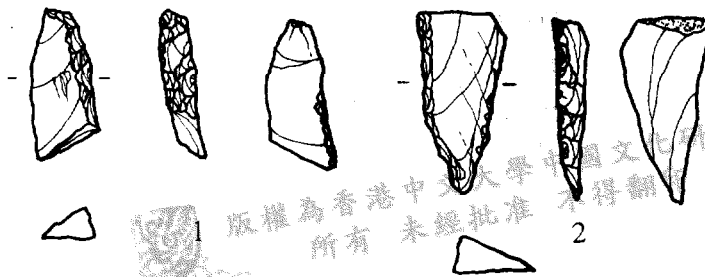


圖2：西樵山東麓遺址

1, 2, 琢背小刀。（依曾騏1981，筆者草圖）

58 芹沢長介：《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土器の起源》，《歴史教育》，卷17-4，1969。
《舊石器時代 日本（下）》，《文化評論》，No. 238，1981，頁194。

59 同注52，頁198。

60 曾騏：《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考古與文物》，4期，1981，頁1-12。

61 橋本勝雄：《長崎縣福井洞穴の細石刃生産技術について—第2、3層を中心として—》，《考古學論叢》，寧樂社，1983，頁105-136。

來，九州原始文化的故鄉，可能就是黃河以南一帶的地域。福井和泉福寺遺址裏，並沒有發現過忍路子技術、蘭越技術和荒屋形雕刻器等代表北方性格的遺物，正好為這一個東亞大陸南方中心起源的說法，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除承鄭德坤教授和林壽晉師不時垂詢和督促外，並蒙下列諸先生賜教以及惠借各遺址實物和文獻資料參考，謹致謝忱。

日本東北大學名譽教授芹沢長介、須藤隆助教授、筑波大學加藤晉平教授；

韓國建國大學崔茂藏教授；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李亨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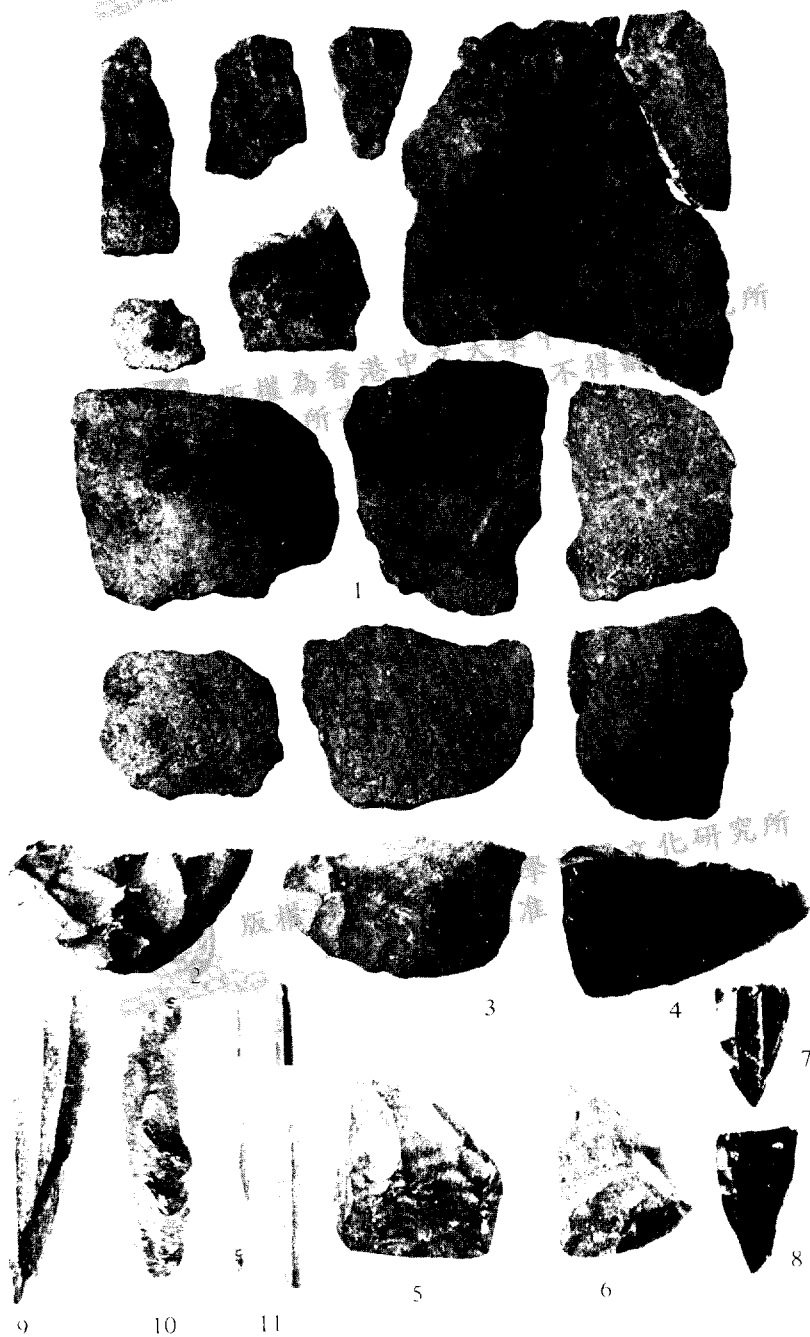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賈蘭坡教授和蓋培先生；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曾騏先生。

八五年五月十二日完稿

後 記

今年五月中賈蘭坡教授於中文大學講學期間，筆者曾請教賈教授有關江蘇省溧水縣神仙洞遺址裡出土的陶片是否可信等問題。賈教授指出這很可能是一塊小陶片，不過目前還有不同的意見。事後賈教授從北京惠寄論文《劃分第四系的標誌》（《史前地震與第四紀地質文集》1985，頁130—133），文中論述：「我以為在一萬多年前出現了陶器也並非不可能的事」，與筆者意見吻合。又韓國建國大學崔茂藏教授訪問中大期間，對於韓國鰲山里遺址出土約8,000年前陶器的年代測定，表示有所保留，一併附記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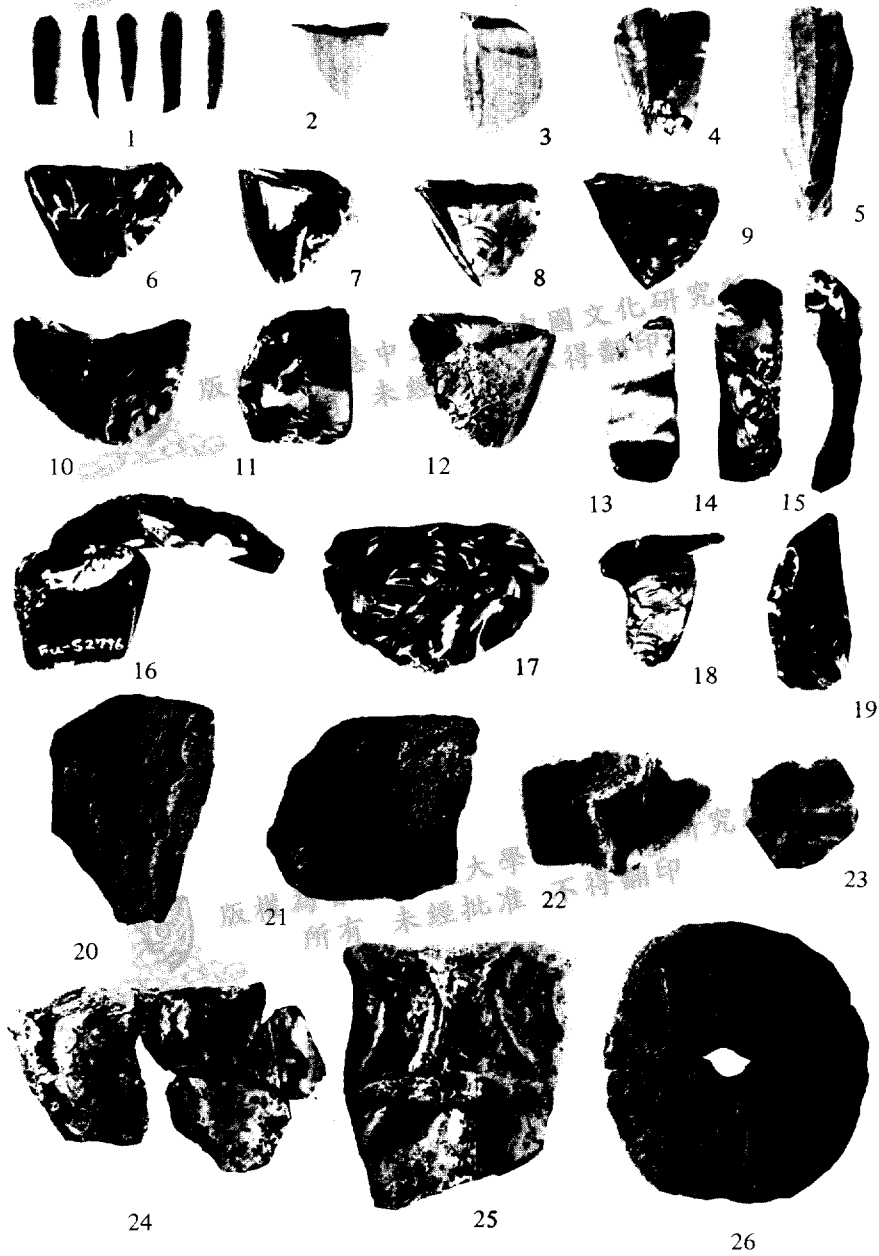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圖版 1：日本九州泉福寺遺址出土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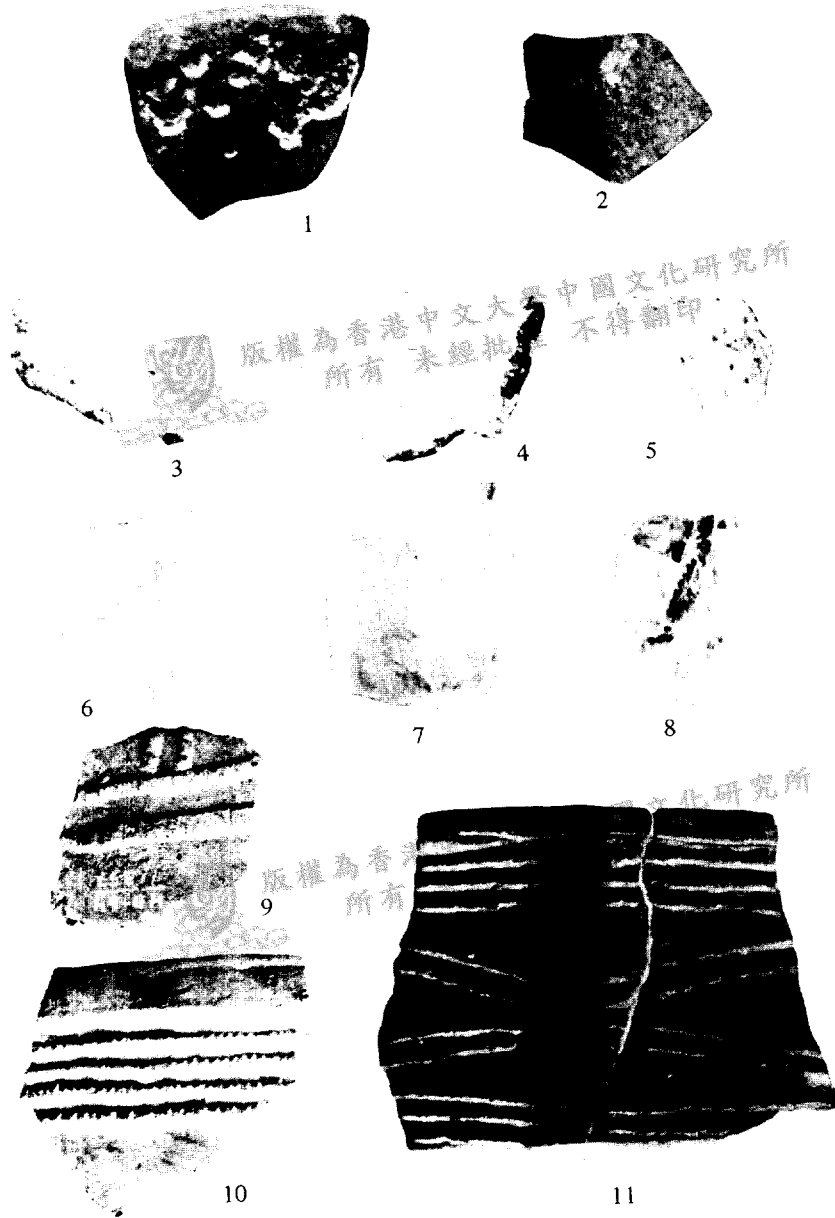
1. 豆粒紋陶器；2, 3, 細石葉石核素材；4, 5, 6 細石葉石核；
7~9 細石葉石核工作面；10, 第一削片 (First spall)；11, 細石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版 2：九州長崎福井遺址出土遺物

1. 細石葉；2~9, 11, 12, 19 細石葉石核；10 細石葉石核素材；
13~15, 削片；16~18 細石葉石核與削片接合重組；20~25 隆線紋陶器。
26 陶環。



圖版 3

1, 2, 鳥蛋皮; 3, 4, 5, 陶片; 6~8, 細石葉外蒙古
 烏斯季恰克圖遺址; 9, 11, 陶片グロマト, ハ遺址;
 10, 陶片ノボパトロフカ遺址, 西伯利亞。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鄧聰



圖版 4：韓國江原繁山里遺址出土陶器

1, V①層；2, V⑦層；3, V⑥層；4, B 地區
5, (地表)；6, V⑤層。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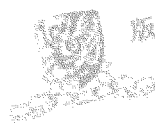
On the Earliest Ceramic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A Summ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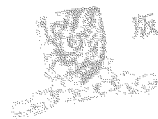
Tang Chung

The age of the earliest ceramic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has been determined through radiocarbon dating as follows: Japan and Mongolia, 12,500 B.P.; South China, 10,000 B.P.; North China and Siberia, between 9,000 and 10,000 B.P. and Korea, 8,000 B.P. This shows that it is quite likely that the earliest innovation in ceramic technique took place around 14,000 to 13,000 B.P. and was adopted by various races from different regional centres at the end of late Pleistocene age in East Asia, that is, around 10,000 B.P.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Japan's early ceramic assemblage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It goes from toryu-mon (bean relief) pottery (around 12,000 B.P.) to ryusen-mon (linear relief) pottery (around 12,000 to 10,000 B.P.) and to tsumegata-mon (fingerial tips impression) pottery (around 9,000 B.P.). The bean relief pottery of Senpukuji Cave site stratum 10 and the linear relief pottery of Fukui site stratum 3 both seem technically too advanced to be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attempts at pottery making. The autho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se kinds of ceramic technology in Kyushu Japan possibly originated from South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Pleistocene 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